

早期中共高層的路線清算與權力角逐

• 阮思余

權力更替，除了國家層面的權力交接之外，還有就是政黨內部高層的權力爭奪。在今天的社會科學與政治理論中，人們在談到權力更替的方式之時，往往會想到民主政治裏的競爭性選舉，甚至視之為唯一方式，這就勢必容易屏蔽掉其他形式的權力爭奪。就此而言，如果我們去追尋中國共產黨早期（1949年以前）黨內的權力更替，便需要追問如下問題：中共早期是採用何種方式解決權力更替的問題？路線清算之於權力爭奪有何意義？整風運動之於路線清算又有何意義？

中共早期解決黨內高層權力更替的方法就是持續的路線清算。王明等國際派開創了中共黨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先河。從毛澤東被清算的歷史來看，路線清算包含雙重含義：除了要清算錯誤的思想路線之外，還要警惕新的篡權奪位的思想。

一 路線清算是權力角逐的一貫方式

談到路線清算與權力角逐，或者說修改歷史與極權控制之間的關係，我們不能不回到奧威爾 (George Orwell) 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該書有一些經典的論述值得我們反覆咀嚼，例如，「黨的口號是：『誰控制過去，誰就能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誰也就能控制過去。』」「全部歷史就像一張不斷刮乾淨重寫的羊皮紙。」「等到文字改造成功了，革命也就成功了。」^①這就是說，對歷史清算的徹底與否，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能否掌權以及掌權的徹底性。易言之，要更好地掌握和控制權力，就必須適時清算歷史。於是，歷史可以而且必須重寫，甚至是按照少數人的意志被自由地重寫。當這一切順利完成之後，奪取權力也就指日可待。簡言之，在集(極)權政治裏，路線清算是權力爭奪的文明策略。

中共早期解決黨內高層權力更替的方法就是持續的路線清算，或者說路線鬥爭。可以說，中共早期的歷史就是一部路線清算史。對這一傳統的認同，黨內外已有高度的共識，只是表述的方式不同而已。就其方針而言，王明等國際

派開創了中共黨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先河。如果從毛澤東被清算的歷史來看，路線清算包含雙重含義，即除了要清算錯誤的思想路線之外，還要警惕新的篡權奪位的思想。

(一) 路線清算的認同：一種共識，各自表述

不管是哪一派，都承認中共黨內實際上存在着兩條路線的鬥爭。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毛澤東、官方史學以及王明那裏找到答案。毛本人就特別強調路線清算的重要性。共產國際駐中共蘇區的聯絡員兼塔斯社駐華記者弗拉基米洛夫 (Peter P. Vladimirov) 在1945年5月26日的日記中詳細記述了毛的反思^②：

大革命的最後階段，黨是不純的 (毛指的是思想意識領域)。在那個階段，我們還沒有清算過陳獨秀。在內戰期間，我們沒有清算李立三路線，因此黨的路線是混亂的，犯了錯誤。內戰末期，我們沒有清算張國燾路線，黨遭到了大損失。遵義會議以後，我們還沒有清算這些錯誤。六中全會上我們才作了個總結，那時才清算了這些路線。

以後，我們經過了三年的整風時期。

這樣，從遵義會議到現在，中間經過了幾個階段，黨才消除了這種不純。

延安整風運動以來，毛澤東等模仿蘇聯《聯共黨史》的做法，將中共黨史詮釋成兩條路線的鬥爭史，亦即「毛澤東所代表的正確路線與其他錯誤路線不斷鬥爭的歷史」^③。後世正統官方史學非常重視、大肆宣揚中共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文革期間更是對其大書特書，將1949年以前中共路線概括為如下六種「左」或「右」的錯誤路線：(1) 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2) 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路線；(3) 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路線；(4) 羅章龍右傾分裂主義路線；(5) 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6) 張國燾右傾機會 (分裂) 主義路線^④。

毛澤東眼中的主要「教條主義者」王明也持兩條路線鬥爭論。不過，王明指出，與毛等強調的兩條路線鬥爭，即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同上述種種錯誤路線鬥爭不同的是，「真正的兩條路線鬥爭，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路線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各個時期的路線之間的鬥爭。……極其重要的是在各個時期，特別是從三十年代開始，中國共產黨不斷地同毛澤東的反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反黨、反蘇和反人民的路線及政治方針進行了長期的、複雜而艱巨的鬥爭。」^⑤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路線清算與路線之爭主要集中於中共高層。就整風而言，一般黨員並不了解整風的真正意義。畢竟，「思想意識的鬥爭，主要集中於黨的上層」^⑥；而且，其實質就是中共高層的權力角逐。弗拉基米洛夫有很透徹的分析。他在1943年6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只要玩弄馬克思主義能保證擴大他的權力，毛澤東就在表面上接受它。可是一旦馬克思主義開始限制他的權力，他就對之宣戰。」^⑦1945年7月13日，他再次就此發表評論，指出中共黨內的

延安整風運動以來，毛澤東等模仿蘇聯《聯共黨史》的做法，將中共黨史詮釋成兩條路線的鬥爭史，亦即「毛澤東所代表的正確路線與其他錯誤路線不斷鬥爭的歷史」。後世正統官方史學非常重視、大肆宣揚中共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文革期間更是對其大書特書。

權力鬥爭之所以如此激烈和殘忍，是因為「它實際上是中共黨內兩種思想——毛的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思想——爭奪最高權力的鬥爭」^⑥。

(二) 路線清算的方針：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黨內路線鬥爭，已經成為正統的官方史學的重要內容，這就是所謂的中共兩條路線鬥爭史。這一路線鬥爭的經典表達就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其目的是通過殘酷的路線清算，極力打倒現任領導人，為自己上台提供「合法」依據。

「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始作俑者乃王明、共產國際執委兼東方部部長米夫 (Pavel Mif) 等黨內的國際派。1931年1月7日，王明、米夫等在批判「立三路線」和瞿秋白的「調和主義」時指出，對待這些人的態度，「不是與他談話的問題，開甚麼會議的問題，而是要毫不妥協地與他公開鬥爭。」而且表明了鬥爭的決心，這就是，「敵人用盡一切力量來向我們進攻，我們應該做甚麼事呢？」「我們要……用鬥爭的力量來消滅他。」^⑦中共中央在1931年1月25日發布的〈為肅清李立三主義反對右派羅章龍告全體黨員和青年團員書〉中強調，「與立三主義及對他的調和態度，作殘酷的理論與組織上的鬥爭」，「對於羅章龍、廖慕群 (即何孟雄) 等同志為代表的右派份子，給了無情的打擊」^⑧。從此，「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作為黨內鬥爭的極端方針正式登上歷史舞台。只是，歷史經常愛捉弄人。當年由王明所開創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一套路線清算的方法，在整風運動期間，竟被毛澤東等用來清算王明自己。這就是所謂「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作為處理黨內分歧的方針，具有一些典型特徵：(1) 以「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作為指導思想；(2) 以簡單粗暴，甚至不惜致人於死地作為整人方式；(3) 以懲辦主義、打壓制裁作為組織處理方法。就整人方式而言，其主要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第一，將解決黨內分歧視為一部分人與另一部分人的鬥爭；第二，通過「批判會」、「同志審判會」的方式展開鬥爭；第三，在批判中不是擺事實、講道理，而是無限上綱上線，甚至要「用布爾什維克的鐵錘將他粉碎」；第四，根據政治需要，對所謂「犯錯誤」的人進行沒完沒了的批判，而「犯錯誤」的人也永世不得翻身^⑨。

其後果就是，黨內分歧容易演變為黨內的派別鬥爭；批判會、審判會容易激化派別之間原本就存在的矛盾；無限上綱上線容易導致採取極端的方式來處理派別矛盾；建立在政治需要基礎上的無休無止的批判，容易強化「犯錯誤」者永世不變的身份特徵。

(三) 路線清算的個案：拒絕皇帝，謹防篡權

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毛澤東的作戰原則，即以保存、壯大實力為目的，以集中優勢兵力攻打敵人的薄弱環節，被臨時中央政治局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等待主義」。最典型的表現就是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對毛軍事路線的批判^⑩。早在1930年，時任中央前敵委員會主席的毛就遭到了謝漢昌、劉敵等的

「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後果就是，黨內分歧容易演變為黨內的派別鬥爭；批判會、審判會容易激化派別之間原本就存在的矛盾；無限上綱上線容易導致採取極端的方式來處理派別矛盾；建立在政治需要基礎上的無休無止的批判，容易強化「犯錯誤」者永世不變的身份特徵。

批判。12月12日，富田事變發生後，謝漢昌、劉敵率紅二十軍在江西吉安縣永陽成立了「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並採取了四項緊急措施，其中一項就是公開批判毛澤東。他們通過張貼大量標語和〈告同志和民眾書〉，指責毛有「當皇帝思想」，宣稱「黨內大難到了」，甚至提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⑬。這裏的朱、彭、黃，即朱德、彭德懷、黃公略。

12月15日，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發出〈江西省行委緊急通告第九號〉，該通告對毛澤東進行了無情的批判：「毛澤東是個徹頭徹尾的右傾機會主義者、虛榮思想的傳播者和黨組織的敵人。在他身上表現出逃避戰鬥、取消革命的階級鬥爭的思想。他是共產黨的十足的叛徒、布爾什維克務必毫不遲疑地把他從隊伍中驅逐出去。」「我們向全國的黨和青年團組織揭露毛澤東的陰謀，動員他們反對毛澤東，為的是不讓他摧毀江西黨組織，不讓他把黨變成自己的派別組織，不讓他本人成為黨的皇帝，以致斷送中國革命。」「不挫敗毛澤東的惡毒陰謀，則不僅江西黨組織，而且整個中國革命都要遭殃。」^⑭

如果說上述主要反映的是黨內對毛澤東的公開批判的話，那麼，在私下場合，黨內的老革命者也不忘對毛作出批判。1934年10月16日晚上，項英在同李德（布勞恩 [Otto Braun]）的談話中，就流露出對毛展開派別鬥爭以及奪取軍權和黨權的顧慮^⑮：

不能忽視毛〔作〕為反對黨的最高領導而進行的派別鬥爭，毛暫時的克制不過是出自於策略上的考慮。他〔項英〕說，毛可能依靠很有影響的、特別是軍隊中的領導幹部，抓住時機在他們的幫助下把軍隊和黨的領導權奪到自己手中。我〔李德〕同意項英的疑慮。

根據師哲的回憶，毛澤東後來也不忘，實際上，是故意在斯大林面前控訴其橫遭錯誤路線打擊之苦。1950年1至2月，在毛訪問蘇聯期間，一次斯大林將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單獨請到一個房間談話。毛再次向斯大林談起他曾在中國十年內戰期間慘遭錯誤路線打擊、排擠之苦。突然，毛指着王稼祥說：「就是他們打擊我，他就是在蘇區犯錯誤的一個。」王、周聞此十分緊張。斯大林回應道：「啊！王大使！你還這麼厲害，你也是犯錯誤的一員。」毛接着說：「他早改正了，而且現在還是得力的幹部。」^⑯

二 整風運動是路線清算的巔峰之作

雖然以往也有各種路線清算，但是，就其規模與徹底性來說，遠遠無法與整風運動相媲美。毛澤東發動和操控的整風運動主要包括如下內容：黨內高層的鬥爭與黨的中央權力機構的改組；全黨的思想改造；審查幹部的歷史和「肅反」；新制度的創設。其中，處於中心地位的是黨內高層的鬥爭與黨的中央權力機構的改組^⑰。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整風運動堪稱中共黨內路線清算的巔峰之作。

毛澤東發動和操控的整風運動主要包括：黨內高層的鬥爭與黨的中央權力機構的改組；全黨的思想改造；審查幹部的歷史和「肅反」；新制度的創設。其中，處於中心地位的是黨內高層的鬥爭與黨的中央權力機構的改組。整風運動堪稱中共黨內路線清算的巔峰之作。

(一) 整風運動的目的

整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改變黨內權力結構，奠定毛澤東在黨內的核心地位。從民族主義的視角來看，論者質疑毛為何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開展聲勢浩大的整風運動。1942年5月18日，弗拉基米洛夫寫道：「我很奇怪，在同日本進行長期戰爭、中國處於生死存亡關頭的情況下，毛澤東卻大談特談『整頓黨的作風』這樣的問題。黨的作風也許需要整頓，但這無疑是個次要問題。」^⑩他後來發現，毛這樣做的原因，主要是出於中共內部鬥爭需要的考慮。在6月10日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我從和中國同志的談話中，明確認識到，中共領導在表面上看來是鐵板一塊，實際上內部一直在進行激烈的鬥爭。」^⑪

其實，這一點都不奇怪，毛就是需要通過這種激烈的鬥爭，樹立自己在黨內的唯一領袖的地位。在抗戰之初，毛最關心的問題主要有二：一是在處理好國共關係的基礎之上，壯大中共及其軍隊的實力；二是通過改造中共高層的權力結構，奠定自己在黨內的核心地位^⑫。毫無疑問，對於毛來說，第一點是策略性的，第二點才是他最關心的問題。易言之，抗戰為毛提供了改變黨內權力機構，樹立自己領導權威的契機。事實證明，毛也確實很好地利用、抓住了這一契機。

毛要奠定其在黨內的核心地位，就必須掌握意識形態的解釋權。在相當長的時期之內，不管是從王明等人在中共黨內的發迹來看，還是從他們對中共的掌控來看，意識形態都是他們的殺手鐮。誠如高華所言，「意識形態成為王明、博古、張聞天等唯一真正具有優勢的領域，也是他們看家護院僅有的一塊陣地，中共理論、宣傳部門長期由王明等留蘇派把持也就不足為奇了。」^⑬而在很大程度上，毛對王明的嫉妒亦來源於此。「毛澤東對王明素無好感，憤恨王明仗莫斯科的支持而獲得黨內高位。毛也嫉恨王明壟斷了與斯大林的聯繫，『挾天子以令諸侯』。毛更難以容忍王明以中共唯一理論家自居，獨霸了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⑭

掌握意識形態，最重要的是可以根據政治的需要，獨霸意識形態的解釋權。「誰獲得對馬列經典的解釋權，誰就控制了黨的意識。換言之，即使擁有軍權和黨權，若無意識形態解釋權的支持，對黨和軍權的控制也難持久。」^⑮因此，對於毛來說，整風運動的過程，也就是其改變、執掌意識形態解釋權的過程。如高華所言^⑯：

1941-1942年毛澤東的全部興奮中心都圍繞着一件事，這就是如何構築以自己思想為核心的中共新傳統，並將此注入到黨的肌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整風運動確實是一場對馬列原典的革命，它以教化和強制為雙翼，以對俄式馬列主義做簡化性解釋為基本方法，將斯大林主義的核心內容與毛的理論創新，以及中國儒家傳統中的道德修養部分互相融合，從而形成了毛的思想革命的基本原則。

總之，上述是從正面闡述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的目的。而在王明、弗拉基米洛夫等人看來，毛發動整風運動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在黨內高層赤裸裸地奪

對於毛澤東來說，整風運動的過程，也就是其改變、執掌意識形態解釋權的過程。而在王明、弗拉基米洛夫等人看來，毛發動整風運動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在黨內高層赤裸裸地奪權。兩者結合起來看，其核心思想都是毛旨在奪取黨內最高權力。

權。如果將這兩者結合起來看，不難發現，它們之間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其核心思想都是毛旨在奪取黨內最高權力。王明指出，「毛澤東千方百計並經常偽造中共歷史的目的在於反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和反蘇，在於用反革命的毛澤東主義來偷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在於神化他個人並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²⁸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記中也多次提到毛對權力的頂禮膜拜。1944年9月15日，他寫道：「權力，才是他〔毛澤東〕唯一的夢想和野心……除了權力之外，一切都是塵埃。」²⁹「毛澤東認為，活着就是為了權。有權就有理，有權就是勝利，有權就有了一切。」³⁰12月25日，他繼續寫道：「毛通過拼命奪權來壓制每一個人。他的全部『理論』，只不過是為這種一直縈繞心頭的目的打掩護而已。」³¹「他所全神貫注和熱切希望的，只有權力……凡是與鞏固他個人權力不相容的事，也就是與中共不相容的事——這就是毛澤東的終極的政治信條。」³²1945年6月26日，他再次寫道：「毛澤東的主要目的，是不惜一切代價地要在這個國家奪取政權。他之所以對黨有興趣，只是因為黨能保證他奪到這個權力。」³³

(二) 整風運動的策略

毛澤東要執掌黨的意識形態的解釋權，就必然涉及到清算歷史與重建黨史。在這一過程中，劉少奇幫了毛的大忙，由此，毛劉結盟取代了毛張結盟，並且正式走上政治前台。在此基礎之上，毛所要實現的就是一網打盡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這兩大宗派。具體策略如下：

一、從執掌軍權、黨權到操控意識形態的解釋權。毛執掌中共並不是一步到位，而是經歷了一個從軍權、黨權再到意識形態的解釋權的過程。在1935年的遵義會議上，毛逐漸掌握了軍權；在1938年的六屆四中全會上，毛取代張聞天成為中共最高領袖，執掌黨權。接下來，毛需要的就是逐步獲得意識形態的解釋權，而這恰是整風運動的要義所在。「毛的當務之急是將留蘇派從權力核心地帶引開，先鞏固軍權，進而奪取黨權。」³⁴因為，毛深知，一旦有了軍權和黨權，要獲得意識形態的解釋權只不過是水到渠成之事³⁵。

二、從清算歷史到重建黨史。清算歷史與重寫黨史，這是一體兩面之事。清算歷史，也就意味着要砸碎舊的領導機構；重寫黨史，也就意味着要建立新的權力結構。而整風運動也確實包含着「破」與「立」這雙重內容。所謂「破」，指的是鏟除政治對手；所謂「立」，指的是建立以自己為核心的新的領導機構³⁶。1941年10月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之後，毛決定成立一個以他領銜的專門機構來清算前期黨史。這就是所謂的「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其組成人員主要包括毛澤東、任弼時、康生、王稼祥、彭真等。這一機構的主要任務就是按照毛的意圖重寫中共黨史³⁷。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重寫後的中共黨史也就是一部毛的逐步掌權史。1944年4月1日下午四時，毛在和王明談話時，直言不諱地道出了整風的目的所在³⁸：

首先，為甚麼需要整風？整風運動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創造條件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寫成我個人的歷史。究竟用甚麼辦法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呢？必須

毛澤東要執掌黨的意識形態的解釋權，就必然涉及到清算歷史與重建黨史。在這一過程中，劉少奇幫了毛的大忙，由此，毛劉結盟取代了毛張結盟，並且正式走上政治前台。毛所要實現的就是一網打盡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這兩大宗派。

創立毛澤東主義。如果沒有毛澤東主義，那麼，又怎能做到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寫成毛澤東個人的歷史呢？

三、從毛張結盟到毛劉結盟。在不斷的黨內鬥爭中，毛注意到政治結盟的重要性。遵義會議之後，毛與張聞天結盟，反對博古，導致張聞天取代博古，執掌黨權，而毛掌軍權的格局。劉少奇對張聞天的開炮改變了這一結盟格局，從此開啟了毛劉結盟的歷史。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劉少奇向張聞天開炮。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劉少奇就中共十年來的政治路線問題向張聞天發難。其致命之處在於，劉「用釜底抽薪的辦法全盤否定了十年政治路線」^⑳。這是毛劉政治聯手的第一步，其意義影響深遠。高華指出，「它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前奏和一次針對『教條宗派份子』的短促突擊，為以後毛澤東、劉少奇全面批判六屆四中全會政治路線，聯手打倒王明等製造了輿論。」^㉑

其次，毛澤東公開將劉少奇納入「正確路線」的行列。從1940年冬到1941年6月，毛用了半年時間，精心推出了黨的秘書文件集《六大以來》，該書收錄了劉代表正確路線的四篇文章。其目的是，「毛通過此舉向全黨高級幹部明確表示，只有劉少奇才是毛『正確路線』的真正擁護者」^㉒。

再次，毛、劉、康構成了整風運動的三巨頭。為領導整風運動，毛建立了專門的機構「中央整風運動委員會」。其成員主要包括劉少奇、康生、陳雲、彭真、高崗和李富春^㉓。而三巨頭毛、劉、康在整風運動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劉少奇是整風的理論家，康生是整風的實際組織者，而中共中央主席則是整個運動的教父。」^㉔

四、從個別批判到一網收盡教條主義宗派與經驗主義宗派。在以往的歷次路線鬥爭中，往往都是針對某一個人、某一種路線展開清算，正如前文所述的六種「左」的或者「右」的路線鬥爭一樣。而毛所發動的整風運動，則是要實現從個別人、某一路線到一網收盡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這兩大政治派別的轉變。這就首先需要劃分黨內的政治派別。在整風運動期間，毛將黨內各種力量分為三派：一是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宗派，如博古、王稼祥、張聞天、凱豐、楊尚昆等；二是以周恩來為首的經驗主義宗派，如朱德、彭德懷、陳毅、鄧發、李維漢、葉劍英等；三是以毛本人為首的正確路線派，如劉少奇、任弼時、康生、彭真、高崗、林彪、鄧小平等^㉕。這樣，除了正確路線之外，教條主義宗派與經驗主義宗派都屬於毛所要批判、教化的對象。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作公開檢討的也正是這兩部分人。

整風運動表明，掌握了軍權與黨權的毛在運用路線清算方面，確實要比歷次路線清算的發動者更加具有政治優勢，更加游刃有餘，也更加容易達到預期目標。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整風運動堪稱毛、乃至整個中共歷史上路線清算的上乘之作。從此，毛不僅改變了中共高層的權力結構，而且牢牢掌握了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誠如高華所言：「延安整風運動是毛澤東運用其政治優勢，徹底改組中共上層機構，重建以毛為絕對主宰的上層權力再分配的過程。同時，延安整風運動又是毛澤東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徹底轉換中共的『俄化』氣質，將中共改造成為毛澤東的中共的過程。」^㉖

整風運動表明，掌握了軍權與黨權的毛在運用路線清算方面，確實要比歷次路線清算的發動者更加具有政治優勢，更加游刃有餘。從此，毛不僅改變了中共高層的權力結構，而且牢牢掌握了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

三 結語：路線清算源遠流長

中共成立早期，在黨的思想路線尚處於不斷摸索的階段，在尚未找到為大多數革命者所一致公認的革命路線之前，持續清算各種革命思想及其「錯誤」的路線，或者是清算那些圖謀篡黨奪權的異端思想，確實有其必要性。這也是角逐黨內最高領導權的一種較為「文明」的方式。問題只是在於，路線清算開啟了一個非常惡劣的方針，這就是所謂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就使得路線清算容易成為少數領導幹部攫取黨的領導權的有效工具與合法藉口。整風運動就是這種工具運用的經典「佳作」。其所開創的諸多做法被後世所沿襲，甚至不斷發揚光大，所謂路線清算源遠流長。比如，最高領導人僅僅掌握了軍權、黨權也不能形成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還必須牢牢掌握意識形態的解釋權；必須根據政治鬥爭的需要適時清算歷史，以及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建歷史；沒有固定不變的政治結盟，必須從政治鬥爭的需要出發，適時調整政治結盟；要在政治鬥爭中區分不同的政治派別，而且要善於發動派別鬥爭，從派別上消滅或者打擊異己，而不是單打獨鬥。惟其如此，路線清算才能夠徹底推進，並實現其預期目標。

路線清算是角逐黨內最高領導權的一種較為「文明」的方式。但是，路線清算開啟了一個非常惡劣的方針，這就是所謂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就使得路線清算容易成為少數領導幹部攫取黨的領導權的有效工具與合法藉口。

註釋

- ① 奧威爾(George Orwell)著，藤棋、金騰譯：《一九八四》(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2)，頁17、20、29。
- ②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弗拉基米洛夫(Peter P. Vladimirov)著，呂文鏡等譯：《延安日記》(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頁428；430；79、110；465-66；154-60；13；20；245；305；455；149。
- ⑳ 陳永發：《中國七十年近代史》，修訂版，上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317。
- ㉑ 廣東省高等院校政治理論課《中國共產黨兩條路線鬥爭史講義》編寫組：《中國共產黨兩條路線鬥爭史講義》，修改稿(廣州：1974年1月)，第一、二章；哲學系七四級工農兵學員：〈中共黨內十次路線鬥爭史講稿〉，中山大學，1977年6月。
- ㉒⑳㉓㉔ 王明著，徐小英等譯：《中共50年》(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頁7、137；9；63；57。
- ㉕⑳㉖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中共六任領袖新視角》(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88；388；387-94。
- ㉗⑳㉘㉙㉚㉛㉜㉝㉞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60-61；21-22；122；192；135；186；304；193；229-30；290；93；97；201-202。
- ㉟ 布勞恩(Otto Braun)著，李達六等譯：《中國紀事》(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頁107。
- ㊱ 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451。
- ㊲㊳ 高華：〈前言〉，載《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xi；xii。
- ㊴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頁74-75；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617。